

對抗制度的創新：策略行動者的能動性實踐

Innovating Against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 Agency of Strategic Actors

涂敏芬 /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Min-Fen T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Received 2010/11, Final revision received 2011/12

摘要

策略行動者在不同的脈絡情境下，會如何實踐能動性，來改變與創新制度呢？此問題背後所關注的是行動與結構兩股力量的互動與抗衡，對此，本研究將根據制度興業的理論觀點，探討行動者（興業家）如何運用策略，改變其所處的制度環境。因此，關注重點將置放於行動者實踐能動性之策略行動構面，以及其與所處脈絡環境所產生的鑲嵌性，並以場域的制度化程度與行動者位置這兩個構面，解構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脈絡條件，藉此整理文獻發展一個制度策略的整合架構，來解釋行動者（興業家）在不同情境下會如何創新不同的制度與帶動制度改變。

【關鍵字】制度興業、制度策略、鑲嵌性、脈絡、能動性

Abstract

How do strategic actors embody agency to change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focus is 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unterbalance between action and structure. Thu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literature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o examine how actors execute agency when engaging with micro-level strategic actions to change or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I examine the interplay among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the institutional strategy, and the embedded environment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embeddedness. I develop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comprising two dimensions—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n actor's position within the field—to shed light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es.

【Keywords】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ional strategy, embeddedness, context, agency

壹、導論

這是一個穩定的時代，也是一個變動的時代。根據制度理論的說法，穩定是必然存在的力量 (Meyer & Rowan, 1977; DiMaggio & Powell, 1983)，制度就像「鐵籠」(Iron Cage) 是讓社會行為趨同的引導力量，同時提供詮釋社會行為意義的結構，使得場域中的組織或個體產生重複行為，亦即不同的個體與組織之間的差異性減少，展現同形化趨向。然而，制度的改變與創新亦是近年來的重要研究議題 (Bush, 1987)，在目前社會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許多制度改變現象的發生，例如：新技術標準的興起 (Garud, Jain, & Kumaraswamy, 2002)、新制度實務的流行 (Green Jr, Li, & Nohtia, 2009)、新組織形式的出現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等。然而，假若真如傳統制度理論的主張，場域中的個體行為均出現同形模式，那麼制度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呢？因此，當觀察到制度改變現象時，主要挑戰就是去解釋制度改變的來源。

在制度改變的過程中，我們通常可以觀察到兩股力量的抗衡，其中一個方向是制度結構對於個體或組織行為的制約與束縛，另外一個方向則是個體或組織展現能動性企圖衝撞制度結構的挑戰與破壞 (Hung, 2004; Whittington, 2006)。當制度結構的力量大於個體或組織的能動性，此時社會將展現同形化趨向；相反地，若當個體或組織所實踐的能動性力量超過制度結構的約束力，此時社會中將發生制度改變的現象，而這也是本文亟欲關注的焦點。因此，我們所仰賴的理論觀點必須同時包含「結構」(Structure) 與「行動」(Action) 這兩個面向，而制度興業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觀點的提出正好呼應此般需求 (Hardy & Maguire, 2008; Pacheco, York, Dean, & Sarasvathy, 2010)。制度興業觀點「表現的是行動者對於有興趣且亟欲改變的制度環境，具有從事行動的社會能動性，可以援引足夠的資源去創造新的制度或是改變既有制度」(Maguire, Hardy, & Lawrence, 2004)。亦即本研究將關注重點置放於「行動者」之「策略行動」構面，因為制度得以被改變或創新，是肇因於行動者（興業家）有能力且具技巧性地運用資源、實踐策略、改變制度。

從策略構面切入探究制度興業家帶動制度改變的過程是工具性的，關注重點是此工具能否被行動者有技巧性地且策略性地運用；對此，行動者對場域環境的認知、以及行動者如何獲取資源都是策略行動的重要面向，因此行動者及其策略行動與所處環境所產生的「鑲嵌性」(Embeddedness) 是本文的核心焦點，而且文獻上關於制度興業活動相關研究的推展，多數也都是在「脈絡情境」下進行。換句話說，本文的研究問題即為：「策略行動者（制度興業家）在不同的脈絡情境下，會如何實踐能動性，來改變與創新制度呢？」

本文是一篇理論探討型文章。研究過程在本質上像是寫作的藝術 (Short, 2009)，研究者本身必須相信自己對理論文獻的掌握度與敏感度。惟研究過程中仍有大致方向可供遵循。首先是決定研究議題，一個理想的議題是針對該議題，有大量且相關的概

念型和實證型文章存在，但先前沒有太多回顧的作品或研究出現，且這是一個重要且熱門的議題。誠如本研究，制度興業此概念在 DiMaggio (1988) 引入後，文獻數量迅速增加，過去十多年來，有超過 60 篇的文章與專書章節的發表 (Hardy & Maguire, 2008)，也先後有期刊以特刊的方式探討相關議題 (Dacin, Goodstein, & Scott, 2002; Garud, Hardy, & Maguire, 2007)。其次是建構詳盡的文獻資料庫，從頂尖學術國際期刊中，包括：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Organization Science、Organization Studies、Journal of Management 等搜尋相關研究，以及從相關的學術專書中 (Campbell, 2004; Greenwood, Oliver, Suddaby, & Sahlin, 2008)，試圖建立制度興業的文獻資料庫。最後是文獻整理成果展現新穎洞見，亦即理論探討型文章絕非既有文獻的堆疊，研究者應該以新的角度提出新的見解，因此最後本研究發展一個「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架構」，來彰顯行動者在創新與改變制度的過程中，其所施展與實踐的制度興業策略型態將根據脈絡環境而有所不同。

在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架構中，本研究從兩個構面解構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脈絡條件：一則為「場域的制度化程度」，可區分為「低」(萌芽場域)與「高」(成熟場域)兩種程度，亦即為我們所觀察到的新制度是從全新的場域中萌芽出來的，亦或是從既存場域中被創造出來的；二則為「行動者位置」，可區分為「邊陲位置」與「核心位置」兩個層次，行動者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會影響行動者對於所處場域環境的認知以及行動者如何獲取資源來從事制度興業。本文主張制度興業活動會根據行動者位置與場域制度化程度的交互作用而有所不同，場域制度化程度會影響行動者是否成為制度興業家，但行動者也會根據其所處社會位置的不同而認知到不同的場域條件。

本研究共分為五個部分陳述：第一部分為導論，說明研究背景、研究問題以及研究主張。第二部分為回顧制度理論與制度改變的相關文獻。第三部分，接續探討制度興業、制度興業家、制度策略等。第四部分則是吾人透過上述文獻的鋪陳與詳細地文獻整理，進而提出一個制度興業策略之整合架構，來整理策略行動者為了制度創新與改變，依情境脈絡所施展的制度策略。第五部分為討論與意涵，以表格方式彙整本文的論述邏輯。最後、第六部分則是總結研究結論。

貳、制度理論與制度改變

本文亟欲回答「策略行動者在不同的脈絡情境下，會如何實踐能動性來改變與創新制度」此問題，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對此問題的背景有所瞭解，特別是行動者要對抗的制度是什麼，而這也是傳統制度理論討論的範疇。惟傳統制度理論解釋了制度同形行為，卻也侷限了解釋制度改變的可能性，因此將從此侷限與矛盾著手，接續點出制度改變是一個必定會發生的現象，並探討制度改變的程序、形式以及動機，並突顯出

本文的重點是由內在因素驅動的制度改變。因此，以下將針對制度理論與制度改變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一、制度理論

當代制度理論的重要起點源自於 Meyer 與 Rowan (1977) 的研究，強調一個整體架構下之制度環境的重要性，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過程，制度環境強烈地制約了組織與個體的行為。在他們的研究中，研究對象是被社會大眾認為最有效率的官僚體制，當初官僚體制的興起是為了回應競爭壓力，然而卻透過複雜的關係網絡，將之滲透、擴散、進而被大眾視為理所當然 (Taken-for-granted)。繼而，組織無須思考官僚體制是否適合自己，只要按照社會上慣常接收的型態，亦即官僚組織來組合自己的組織架構即可獲得正當性，而這就形成所謂的制度迷思 (Institutional Myth) 或合理性迷思 (Rationalized Myth)。換句話說，採行官僚體制的正式結構未必使組織資源的運用更為有效，卻可因其具有正當性而獲取外界的認可與支持，是故組織無須快速地適應環境變遷，即使沒有效率也不影響組織的運作與生存 (Meyer & Rowan, 1977)。

接續在 DiMaggio 與 Powell (1983) 的研究中，關心的問題同樣是：當環境複雜度逐漸提高時，是什麼促使組織如此類似？他們的觀察是，組織之間的社會與經濟關係以及組織必須仰賴外部資源的支持，是組織同形或順從壓力的源起，因此當理性正式的官僚體制被大眾視為是一種最有效率的組織架構後，其他組織也會採取相同的組織型態，但對他們而言不見得是最有效率的，但此刻效率的追求已經存而不論，將透過強制的 (Coercive)、規範的 (Normative)、或模仿的 (Mimetic) 機制，使得組織形式和實務作法產生同質性，而這種同質化的過程即為同形。換言之，「制度表現為一種社會秩序或模式，有其特有的狀態與特質，而這種秩序或模式，像是一種慣例將互動過程進行標準化，因此制度成了一種社會模式，展現特有的複現過程」(Jepperson, 1991)。

後來，Scott (2001) 延伸自 DiMaggio 與 Powell (1983)，重新提出三個基本結構 (Pillars) 來解析制度，將強制機制轉化為管制性的 (Regulative) 力量、將規範機制轉化為規範性的 (Normative) 程序、將模仿機制轉化為文化認知的 (Culture-cognitive) 概念。在管制性的制度力量下，強調的是以法令規範當做治理結構，是一種外在控制機制；而在規範性的制度力量下，注重的是以道德架構引領社會生活，以一種內在機制影響行動者；最後，在文化認知的制度力量下，關注的是社會中眾多個體認知到的共同象徵符號與分享意義 (Berger & Luckman, 1966)，個體經由認知使得自己身處於一個經過自我制訂 (Enacted) 的環境中 (Weick, 1969)，而個體之間可經由語言系統、法律系統與貨幣系統、國家疆界等的社會互動與建構，進而形塑對社會的共同意義。這三個基本結構形塑了一個連續帶，「是從有意識的到無意識的、是從法規上強迫的到被視為理所當然的」(Hoffman, 1997)，制度有可能是由其中一個結構所主導 (Hoffman, 1999)，

也有可能是這三種結構的組合 (Wicks, 2001)，在社會生活中劃定了界線來界定何者為正當行為，是行動的導引和資源，同時也是約束與侷限。

在制度學者的研究中，Meyer 與 Rowan (1977) 詮釋為何遵從制度迷思的組織得以存活下來，其中至為攸關的兩個概念就是「正當性」(Legitimacy) 與「資源」，雖然他們並未正式地定義何謂正當性，但已預感了正當性可以阻絕組織不效率的外在壓力。在那之後關於正當性的研究進展相當緩慢，學者多數使用這個概念卻未給予明確定義，直到學者 Suchman (1995) 給了正當性一個較為清楚的定義，係指「一種廣泛性的認知或假設，而這種認知或假設反應出社會群體的特定行為模式，是為構築在一種以規範、價值、信仰、與定義，所展現的社會建構系統」。在學者 Suchman (1995) 的定義中指出了兩個基本觀點：一個是制度觀點，強調了建構式的社會信仰如何得以鑲嵌於系統之中，另一個則是策略觀點，強調正當性是可以被管理與操控的，可以協助組織達到目的，而這正是興業家之策略行動可以著力之處。至此，確立了正當性是制度理論中一個相當關鍵的核心概念，正當性並非是針對某些事件進行個別的分析與評估，而是在社會系統上被概念性地通則化，正當性被主觀地建構，卻是客觀地存在於社會之中。當某個制度已取得正當性後，若組織或個體行為發生了偏離制度的情況，可能是違反法令規定、或是不遵從社會規範與違背文化認知，那麼這些組織或個體都會為他們的偏離行為付出程度不一的成本與代價 (Jepperson, 1991)。

然而，傳統制度理論解釋了制度同形的行為，卻也侷限了解釋「制度改變」的可能性。因為真實情況是，制度同形的強化力量會在長期且逐步轉變的社會中產生「不變」與「改變」的矛盾：第一、組織所面對的環境，包括法規面、政治面、或技術面等，都有可能發生複雜且激烈的改變，使得該制度結構不合時宜 (Farjoun, 2002; Hoffman, 1999)，削弱了既存制度的力量，並增加了與當前社會的不相容性，進而使得既存制度發生崩解，甚或是發生強迫被拋棄的可能性 (Maguire & Hardy, 2009)。第二、從文化角度切入，社會大眾開始質疑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正當性，開始侵蝕並動搖大眾所信仰的文化價值 (Hudson, 1994)。第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微觀層次的行動者開始有了偏離的想法與行為，開始想要去改變存在於鉅觀的制度實務，甚至是創造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實務作法 (Holm, 1995)。

換言之，根據制度理論的說法，在制度同形的情況下，多數情況是制度與行為維持著一種鬆散連結 (Loosely Coupled) 的關係，因此上述之緊張關係與矛盾情況都有可能破壞鬆散連結的關係，改變的想法、期待、與迫切性對相關行為施予壓力，而此壓力使得制度改變成為可能，於是乎，制度理論在文獻發展上轉向於關注個體與組織如何有目的地改變他們所鑲嵌的既存環境 (Dacin et al., 2002)。

二、制度改變

制度改變「就是制度在型態上、本質上或狀態上隨時間發生差異」(Hargrave & Van de Ven, 2006)，於是可藉由觀察兩個或含以上時點在各個制度構面(如慣例或規則等)的特點，藉由評估這些構面的差異，觀察制度是否發生改變。假若差異可以被清楚地判別出來，而這個改變是新奇的或是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這就呈現出制度的創新與改變。

我們可從不同的取向檢視制度改變。首先，從「程序取向」檢視，可區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為「制度形成」，是為一種新邏輯、新治理架構的產生，或為一個新興場域的崛起，例如：加拿大愛滋病新興療法的推廣(Maguire et al., 2004)、美國非營利消費者權益組織的出現(Rao, 1998)等。

第二種情況為「去制度化」，是為既存邏輯或傳統治理架構在功能面、政治面、與社會面的衰敗與消失(Oliver, 1992)，功能面的壓力來自於既存制度的績效層面發生問題，如 DDT 農藥被拋棄的過程(Maguire & Hardy, 2009)，政治面的壓力來自於權力與利益結構的轉移，如加拿大亞伯特省健保體系的重建(Reay & Hinings, 2005)，而社會面的壓力則是來自於場域中群體的差異性與異質性的存在，使得信仰與實務發生不一致的現象，如：台灣社會機制圖像中家族主義力量的式微(Hung & Whittington, 2011)。

第三種情況為「再制度化」，表現為一種新邏輯、新治理架構取代了既存邏輯或傳統治理架構(Scott, 2001)，或為一個成熟場域的轉型，例如：加拿大會計商務領域的組織形式轉型(Greenwood, Hinings, & Suddaby, 2002)、法國美食廚藝的轉變(Rao, Monin, & Durand, 2003)等，一方面啟動了去制度化程序的開始(Munir & Phillips, 2005)，另一面也強調行動者必須嘗試在既存制度利益與違反既存制度所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之中取得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Davis、Diekmann 與 Tinsley (1994) 指出「多數研究隱含著制度化是一個一旦形塑而成，就永為社會所遵從的制度過程」，主張的是行動者獲取正當性的過程(Suchman, 1995)。亦即，聚焦於制度改變研究的學者，早期多數將焦點置放於第一種程序取向的「制度形成」，主要探討一個新制度的建構，以及此新制度在組織場域中後續的擴散程序。這樣的研究隱含一旦新制度在場域中到位之後是呈現聚合的收斂作用，而非主張此新制度後續會如何改變。因此，後續研究制度改變的學者開始關注制度本身歷經制度化的過程(Institutionalization)，包括：既存制度形式的去制度化、以及新制度變成既存制度後再度被另一個新制度所取代的再制度化(Scott, 2001)，「去制度化」與「再制度化」並非是「制度形成」的相反程序而已，討論的是一個既存制度是如何被拋棄，一方面行動者必須表明既存邏輯的不適切性，另一方面行動者也要建構具替代性且可被接受的新作法。

其次，從制度本身的「形式」檢視制度改變，大致可區分為三種類型：首先是「工作實務」，在企業內甚至是工作群體中所執行的工作實務會有所不同，這是最容易被研究者所接近的，因此文獻上許多學者在不同的範圍下觀察制度實務的改變，例如：會計 (Greenwood & Suddaby, 2006)、共同基金 (Lounsbury & Crumley, 2007)、企業的社會責任 (Dejean, Gond, & Leca, 2004) 等。其次是「產業標準」，表現為引導產業演化的規範、準則或主流設計，標準做為一種制度是因為標準限制了廠商的選擇，例如：高科技軟體產業 (Garud et al., 2002)、挪威漁業 (Holm, 1995)、美國汽車產業 (Rao, 1994) 等。最後是「法規政策」，強調的是在政府層次上相關法規政策的研究，例如：政府對連鎖商店營運模式的管控 (Ingram & Rao, 2004)、國家環保政策 (Child, Lu, & Tsai, 2007)、全球環保政策 (Wijen & Ansari, 2007) 等。

再者，從「動機取向」檢視制度改變，主要可歸因於外在 (Exogenous) 因素與內在 (Endogenous) 因素。當場域系統所涵蓋的範圍越狹窄時，則越有可能從是從外在因素來帶動改變，例如：Barley (1986) 研究 1980 年代醫院導入電腦斷層掃描技術對組織的衝擊與改變，此時分析單位聚焦在微觀的個體層次，而新技術的導入則被認為是帶動改變的外在因素；而文獻上所辨識出的其他可能外在因素，則包括因為某個危機或衝擊事件 (Kraatz & Zajac, 1996; Hoffman, 1999; Ahmadjian & Robinson, 2001)、某個法規的調整或改變 (Hillman & Hitt, 1999)、或是某項技術的創新與不連續性 (Anderson & Tushman, 1990; Munir, 2005) 等，此時的研究並非聚焦於制度改變軌跡中行動者的角色，他們歸因制度改變是來自於均衡場域外之外在因素使然，這些外在事件的發生促成了新的成員進入原本的組織場域中，帶進了新的想法，甚至是主張支持新的替代性作法，進而大大地促成制度改變的可能性 (Thornton & Ocasio, 1999; Thornton, 2002)。

而當制度學者將分析單位置放於中間層次 (Meso-level, 如組織層次) 或鉅觀層次 (Macro-level, 如場域層次) 時，則越有可能從內在因素來解釋制度改變。而這可從下列兩項特點來解釋：第一、如果我們承認在現代抽象的社會結構中，存有彼此互動、部分重疊、或競相爭取擁護力量的異質、多元制度系統時，誠如 Friedland 與 Alford (1991) 指出親屬關係系統與資本市場中的工作效率安排，在實際上是互為作用且重疊，但本質上則是相互衝突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後續的研究中，Hung 與 Whittington (2011) 指出策略行動者基於內在改變因素的驅動，由制度策略行動來突破台灣原本固有以家族主義為重的社會機制，來發展專業主義的創新過程。第二、因為納入了行動者的角色與作為，制度改變肇始於微觀層次之個體所懷具的經驗、想法與行動，開始與鑲嵌於鉅觀層次之制度，產生差距與不一致，行動者不再將既存制度是為理所當然，開始思索與反省改變的可能性，而這就是由內生因素所驅動的改變 (Greenwood & Hinings, 1996; Scott, Ruef, Mendel, & Caronna, 2000)，而這些微觀層次的調整、修訂、改善均會

開始毀壞既存制度的基石。

參、制度興業與制度策略

從內在因素切入解釋制度改變是可行的，文獻上發展出「制度興業」觀點，從行動者所懷具的社會能動性，以及他們得以運用的資源、實踐的策略，來解釋制度改變的源由與現象。因此，以下將針對制度興業、制度興業家、以及制度策略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一、制度興業

「制度興業」觀點首被 DiMaggio (1988) 所提出，引入行動者的能動性到制度分析的文章中，闡述「制度改變發生在當行動者 (制度興業家) 具有足夠資源，並且看到場域中的機會，進而去實踐他們認為有價值的目的與利益」。在理論上結合了原本被視為是對立觀點的社會結構與個人行動，認為即使處於某種制度結構的限制下，個體或組織仍有策略選擇的空間，個體或組織具有社會能動性，得以主動地形塑所處環境，進而使得社會制度確實有發生改變的可能性。因此，對於存在於穩定持久的「制度」與有所不同的「改變」兩者間的矛盾，制度興業觀點提供了理論方向的「解答」(Seo & Creed, 2002)。

在制度興業的文獻發展軌跡中，主要可切分為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 (Hardy & Maguire, 2008)：第一、是以行動者為核心 (Actor-centric) 進行探討，強調制度興業家本身的特質、角色與行動，發展邏輯首先是行動者具有反思自省的能力 (Seo & Creed, 2002)，能夠判斷場域中存在的問題或是可能可以改變的機會 (Beckert, 1999)，並擁有較為優異的社會技能來實踐策略行動，藉以獲取利益或達到目的 (Fligstein, 1997, 2001)。第二、是從程序取向 (Process-centric) 出發，著墨於制度興業精神在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過程中所發揮的影響力，強調過程中不同成員間互動時可能發生的衝突與緊張，並且可以觀察到過程中資源、意義與想法的遞移軌跡，甚至是針對新制度作法之論述主張的轉變 (Zilber, 2006; Green Jr et al., 2009)。

以行動者為核心是目前制度興業研究中的主流。然而，若過於強調行動者的能動性與自主性，其研究邏輯隱含的假設為，行動者是理性的、制度興業過程是線性的，誠如 Meyer (1996) 所言：「這類行動者通常具有事先設定的目標、清楚的範疇、明確的技術、統一的指揮權、明確的內部控制系統、而且有明確的資源可以使用」，行動者似乎不須具備因地制宜的行動技巧。這樣的假設邏輯將會忽略制度環境中的限制可能對行動者行為所造成的影響，而這正是制度理論的核心所在，此批判使得制度興業家可能被描述為一種特殊的族群，是過於理性和脫離現實的行動者，因此將落入英雄式解釋的疑慮 (Meyer, 2006)。

惟此般簡化的思維忽略了1990年代以來學者在制度興業研究上的努力，事實上，制度興業蘊含的精神應該使得我們可以去解釋行動者的能動性程度 (Actors' Degrees of Agency)，而此程度的展現則是與行動者所處環境息息相關。因此，Hardy 與 Maguire (2008) 主張若能從程序取向探討制度化過程，研究者則可從較為中立、且動態的角度，觀察行動者本身的行為、行動者與其他群體間的互動、群體與環境之間、以及場域環境本身的變動與演化 (Holm, 1995; Hung & Whittington, 1997; Hung, 2004)。而這也更加強化了鑲嵌性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將奠基於脈絡環境之下，將脈絡環境進行解構，進而解釋制度興業家在不同情境下會如何創新與改變制度。

二、制度興業家

立基於 DiMaggio (1988) 的制度興業觀點中，行動者就是所謂的制度興業家，他們對於有興趣且亟欲改變的制度環境，具有實踐行動能動性的決心，是改變制度的重要角色；而且「制度興業家是一種在分析上可被識別的社會族群，他們對於既存的制度實務具有省思檢視的能力，並且能夠預視替代性的方案與作法」(Beckert, 1999)。

然而，並非所有的行動者均為制度興業家，在本研究的觀點中，行動者必須符合二個條件才能被視為是制度興業家：第一、確實開啟了一個不同的改變或提出一個有別於既存制度的替代性方案，第二、主動地參與推動改變的過程，因此，制度興業家這個角色亦可換稱為「場域形塑者」(Field Makers)、「規範形塑者」(Rule Makers)、「策略性行動者」(Strategic Actors)、或是「制度設計者」(Institutional Designer) 等 (Child et al., 2007; Hoffman, 1999; Scott, 2001)。

三、制度策略 (註¹)

制度興業活動的發生並不是注定的，而是行動者施展策略行動所帶動的，策略行動可視為是居中的斡旋機制，連結了既存制度所產生的鑲嵌性、制度衝突與制度改變。策略行動是具體實踐制度興業精神的作為，Fligstein (1997) 定義「行動係指擁有社會技能的制度興業家，能將欲實踐的利益與目標轉化為一種制度性安排，進而誘發新組織場域成形的作為結果」，可能的作法有：議題設定 (Agenda-setting)、設框行動 (Framing Action)、匯聚眾人 (Aggregating Interests) 以及連結外部人士 (Networking to Outlier) 等。

因此，制度興業家的策略行動展現的是組織行動的某種模式，而這種行動模式關注的是制度、場域的形成與轉型，以及關心那些掌控制度或場域結構的規則與標準，

註¹ 在本文中，我們將「制度策略」與「制度興業策略」當做同一個名詞，所代表的都是興業家如何運用或選擇策略，從事制度改變工作。

概念上同於文獻中所指稱的「制度策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 (Lawrence, 1999)。不同於產業組織文獻中的競爭策略 (Porter, 1980)，制度策略具有社會外部性特質，得以形塑新制度實務在場域中的正當性，去改變原有制度環境中的結構要素，讓新制度能在場域中萌生、成形與擴散，進而進入正當性程序。

除了以制度策略指涉行動者從事改變制度所執行的一連串策略行動之外，文獻上也有學者以「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 意指類似的概念，係指「個體與組織有目的性的行動，而此目的是為了創造、維繫與破壞制度」(Lawrence & Suddaby, 2006)，制度工作概念的發展除了援引制度興業中行動者展現社會能動性的觀點之外 (DiMaggio, 1988)，另一個引入的重要觀點則是來自於社會學中的「實踐」理論 (Bourdieu, 1990; Giddens, 1984)，其理論內涵強調的是「行動」與「執行」的日常互動，而非那些完美無瑕的藍圖與法則。而此意味著行動者將依循當下主客觀的環境條件、利益考量與特殊性等因素來行事，行動者必須具備順勢而為、因時制宜或隨機應變的策略能力。

肆、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架構

基於上述論及之制度興業的相關概念，包括制度興業家與制度策略，以下將更進一步細膩地根據行動者所處環境的脈絡情境，來觀察行動者如何實踐策略行動。本文將行動者所處的脈絡情境區分為二種不同的起始條件，一則從場域的制度化程度來觀察，二則從行動者位置來探討，進而提出本文之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架構。

一、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條件之一：場域的制度化程度

組織場域之制度化程度被辨識為是影響行動者能動性的起始條件之一 (Tolbert & Zucker, 1996)，因此也會影響到後續制度興業活動的發生。而場域的制度化程度約莫可被區分為「高」與「低」兩種程度，然而，文獻上，對於制度興業活動較易從高制度化的組織場域、亦或是低制度化的組織場域發生，是有所爭論的。諸如 DiMaggio (1988) 與 Fligstein (1997) 認為低制度化的組織場域，亦即萌芽場域能夠提供給行動者較多的機會，因為此時的場域環境中沒有既存的制度結構，而 Phillips 與 Lawrence (2000) 同樣也主張未結構化的脈絡環境供予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較高機會，因此，文獻上多數的實徵研究是在萌芽的組織場域中進行 (Dejean et al., 2004; Garud et al., 2002; Lawrence, 1999; Lawrence & Phillips, 2004; Maguire et al., 2004; Rao, 1994, 1998)。然而，制度興業活動卻非絕對是從低制度化的組織場域開始，Beckert (1999) 認為亟欲帶動改變的行動者也會從高制度化的組織場域中，亦即成熟場域中施展策略行動，因為制度帶來了侷限，而 Dorado (2005) 也持相同的看法，因此實徵的相關研究有逐步進展 (Greenwood et al., 2002;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惟實證上該如何判斷場域制度化程度的高低呢？讓我們從「組織場域」的定義著手，文獻上有兩個廣為引用的定義：第一、DiMaggio 與 Powell (1983) 定義組織場域，「涵括了關鍵供應者、資源與產品的消費者、頒訂法規的行動者、以及生產類似服務或產品的其他組織，這些不同的組織會共同地聚集起來構築一個可被識別的制度生活，彼此之間分享著共同的社會意義系統」。第二、Scott (1994) 定義「組織場域隱含某個組織社群的存在，而此社群有一個共同的意義系統，而且相較於社群中參與者與場域外的成員之間，社群中的參與者彼此之間的互動密切」。

第一個定義聚焦於場域的「結構」概念，認為在場域中可以觀察到一個可被識別的制度生活，正如 Suchman (1995) 對正當性 (Legitimacy) 的解釋，這種可被識別的制度生活是奠基在認知的基礎上，是經過長期且逐步的制度化過程後，導致此制度被大眾廣泛且內隱地接受。第二個定義則是聚焦於「關係」概念，強調場域內成員之間的互動程度會高於場域內成員與場域外成員的互動頻率。

準此，在組織場域中，可否觀察到「具有認知正當性的制度結構」以及「場域內外成員的互動方式」這兩項觀察對象，可做為我們辨識場域制度化之相對程度的考量因素。換句話說，高制度化的組織場域的第一個特質是，存有高度認知正當性的既存制度結構，此時穩定的架構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是存而不論了；第二個特質是場域內參與者構成一個可被識別的社群，社群內成員彼此互動密切，且成員間有其特有的結構權力關係。相對地，低制度化的組織場域的第一個特質是，沒有一個穩固的制度結構存在，在認知層次上無法獲得正當性，此時場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第二個特質是缺乏可被清楚辨識的社群存在。

二、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條件之二：行動者位置

行動者位置是行動者關係與其所鑲嵌之場域環境的居中斡旋空間 (Emirbay & Mische, 1998)，社會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會影響行動者對於所處場域環境的認知 (Dorado, 2005) 以及行動者如何獲取資源 (Lawrence, 1999) 來從事制度興業活動。行動者位置約略可區分為身處場域環境的「邊陲位置」(Peripheral Actors) 與「核心位置」(Central Actors) 兩個層次。

文獻上的多數研究認為位處邊陲的行動者較有可能成為制度興業家 (Garud et al., 2002; Haveman & Rao, 1997; Hirsch, 1986; Kraatz & Zajac, 1996; Leblebici, Salancik, Copay, & King, 1991; Rao, Morrill, & Zald, 2000)，因為從邏輯推演上來說，由於邊陲行動者較少鑲嵌在當下的制度場域中，對他們而言，可能是因為較少意識到制度性期待 (Davis, 1991)，或是與場域層次的管理實務大多處於弱連結的關係 (Zucker, 1988)，或是並無過大壓力必須服從既存制度 (因為通常情況是既存之核心成員是既得利益者可獲取所需資源，但位處邊陲之其他成員則否)，因此，由邊陲行動者所發動的制度改

變是自然的，邊陲行動者較有動機與機會去進行改變，是改變與創新制度的潛在行動者。

話雖如此，由邊陲行動者所發動的制度改變卻不是絕對的，文獻上亦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及其相關研究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Greenwood et al., 2002; Sherer & Lee, 2002; Zilber, 2002)。相較邊陲行動者而言，核心行動者通常在既存場域中擁有較為完整的訊息、高度社會化、較有優勢，因此與既有場域環境具有高度鑲嵌性、進而抗拒改變的；然而，可能因為某種緣故，或為功能性壓力、或為經濟壓力、但也有可能是政治壓力或社會壓力，使得核心行動者必須突破鑲嵌於結構中的行動矛盾，成為帶動改變的起頭者。

惟實證上該如何界定行動者在場域中是處於核心位置或邊陲位置呢？讓我們從觀察行動者本身的特質出發，假若某些團體、族群或組織擁有豐富資源，且通常是地位穩固且享有聲望的，因為通常可從既存制度中獲利，因此傾向於支持既存制度並維持現狀，具有這些特質的我們將之稱為核心行動者，反之則將之稱為邊陲行動者。

三、行動者位置與場域特性

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條件，是從場域制度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行動者位置何處開始沒有定論之外，這二個面向彼此之間亦會產生交互作用，場域制度化程度會影響行動者是否成為制度興業家，但行動者也會根據其所處社會位置的不同而認知到不同的場域條件。據此，本文主張制度興業活動會根據行動者位置與場域制度化程度的交互作用而有所不同，因此行動者所施展的制度興業策略型態亦有所不同。

對此，本文以一個 2*2 的分類矩陣 (請見圖 1)，橫軸為場域制度化程度，分為萌芽場域 (低制度化) 與成熟場域 (高制度化) 兩個情況，縱軸為行動者位置，分為邊陲位置與核心位置，並在以下依四種情境進行制度興業策略之脈絡性回顧。

		場域制度化程度	
		萌芽場域	成熟場域
行動者位置	位處邊陲	情境一	情境三
	位處核心	情境二	情境四

圖 1 制度興業策略的整合性架構

情境一：萌芽場域與邊陲行動者

在萌芽場域中，其環境特色是沒有領導組織可供模仿，也無清楚的規則與慣例存在，雖然有人嘗試辨識出某種程度的利益，卻少有共識行動來推動具體的落實 (Hardy, 1994)。在這樣的脈絡環境之下，對於邊陲行動者而言，雖然較既得利益者有更強烈的改變動機與施展能動性的空間，卻是具有「新之不利」(Liability of Newness) 的本質 (Stinchcombe, 1965)，邊陲行動者通常是年輕的組織，並不具備豐富的資源，因此通常會面臨資源不足的窘境，缺乏對環境的影響力，故在此情境下，邊陲行動者實踐策略行動的重點在於如何從資源匱乏的環境中成就自己的目標。

在制度興業的文獻軌跡中，學者 Lounsbury、Ventresca 與 Hirsch (2003) 研究美國資源回收產業的興起，回收運動的發起團體是屬於邊陲行動者，而資源回收產業原本也是一個不存在的場域，但為了鼓吹社會大眾重視環保議題，因此發起團體以「垃圾減量、拯救地球」為呼籲口號，但是這種負面表列的宣揚方式並未引起大眾注意，因此發起團體則改以「垃圾回收、創造利潤」的口號，以正面利得的方式來改變大眾認知，讓大眾知道原來回收也是有利可圖的，這才創造了美國資源回收產業。

美國資源回收產業的案例正好呼應到，基於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on) 基礎 (Berger & Luckman, 1966) 所形塑之制度產生，行動者藉由文字或言語的論述來直接彰顯他們所要推行的新實務意義，透過策略性地設立一個理解框架，給予未知的社會大眾一種說法，來強化或說服他人一同遵從或接受他們所要推行的新實務作法，進而建構認知正當性來取得推動制度改變所需的資源 (Snow, Rochford Jr, Worden, & Benford, 1986; Benford & Snow, 2000; Green Jr, 2004; Suddaby & Greenwood, 2005)。類似作法有：修辭策略 (Rhetoric Strategy) (Green Jr et al., 2009)、說一個動聽的故事 (Story-telling) (Zilber, 2007; Lounsbury & Glynn, 2001)、議程設定 (Agenda-setting)、路徑藍圖 (Road-mapping)、以及積極推廣解釋邏輯 (Conventionalizing Accounts) (McInerney, 2008) 等。

另外，處於萌芽場域、由邊陲行動者改變制度的具體案例為丹麥的風力發電產業，最早在 1950 年代是農夫以廢棄的農具木材發明風車，而後在 1970 年代石油危機時，木匠以木材等現有材料製作風車販售，並吸引包括機械領域與工程領域等的不同領域的人紛紛投入專業知識進行改良，並在 1980 年代已有十家公司在生產風力發電機，這些公司並未大量投資在研發，而是藉由使用過程中與不同領域的人相互學習來進行改良 (Garud & Karnøe, 2003)。

丹麥風力發電產業此案例中，所展現的制度策略是一種稱為「Bricolage」的作法 (Levi-Strauss, 1967)，在此個人將之解譯為「湊組策略」，意義上係指「行動者可就手邊既有資源進行重新組合，並將之用來解決新的問題與發掘可行機會」(註²) (Baker

註² 原文為 “Bricolage as making do by applying combinations of the resources at hand to new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Baker & Nelson, 2005)

& Nelson, 2005)。基本上行動者面對的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環境行動者通常僅能就手邊握有的資源進行拼湊、重組與再利用，或者對於既存之社會資源具有即興取用與創意組合的能力，藉以重新配置環境中的結構與制度 (Clemens & Cook, 1999)。然而，在湊組策略中，資源的存在具有客觀面與主觀面的差別，所謂客觀面係指實體存在的設備、人員等，而所謂的主觀面則是從社會建構觀點來闡述，亦即資源其實並非客觀地存在環境之中，端視行動者本身是否意識到該資源的存在，並察覺到此資源是重要的，而且具備吸納該資源的能力，因此即使兩個擁有類似資源的行動者，結果也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情境二：萌芽場域與核心行動者

同樣在萌芽場域中，依然面對的環境特色是無清楚的規則與慣例存在，但對核心行動者來說，因為其已在另外的環境中累積豐富的資源，因此核心行動者能否改變制度並不取決於資源的豐富度，反而是核心行動者能否克服老化的風險 (Liability of Aging) (Carroll, 1987)，面臨的是類似於創新兩難的困境 (Christensen & Bower, 1996)，核心行動者受限於過往分配資源的慣習、或是囿於既存制度的侷限，反而難以帶動制度改變。故在此情境下，核心行動者實踐策略行動的重點在於如何突破既有窠臼，來成就自己的目標。

在此情境下，文獻上的具體案例可從 Maguire 與 Hardy (2006) 的研究切入，聯合國此國際組織是由全世界的主權國家所組成，因此在全球事務的推動與協調上向來扮演核心角色，除了維持世界和平與維護基本人權之外，聯合國也開始致力於推動環保這個新興萌芽議題，為了促使世界各國願意共同簽署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聯合國從論述策略 (Discursive Strategy) 切入，強調事前預防重於事後整治，並形塑氣候變遷是世界各國的責任，藉由認知的建構與氛圍的形塑，促使世界各國願意共同簽署公約，針對十二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進行規範與管制，這是一個從論述策略出發，藉由法規壓力促成制度改變的過程。

在世界各國共同簽署斯德哥爾摩公約的案例中，由於環保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聯合國難以憑藉一己之力、單獨地執行環保工作，因此在策略作為方面說服性主張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凝聚場域中分散各處的意見，此策略行動在理論觀點上呼應 Snow 與 Benford (1992) 所言：「制度興業家能夠形塑正當性、能夠動員人力物力等資源，其前提是只有當制度興業家能夠描繪新制度實務的推展具有正直正義的目的，並且診斷為何要大眾接受新制度實務的理由，解決改變過程中的抱怨，提供解決方案，如此才可能動員群體的力量一起帶動制度改變」(註³)。

註³ 原文為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can mobilize legitimacy, finances, and personnel only when they are able to frame the grievances and interests of aggrieved constituencies, diagnose causes, assign blames, provide solutions, and enable collective attribution processes to operate." (Snow & Benford, 1992)

另外，處於萌芽場域、但由核心行動者改變制度的具體案例為美國昇陽公司(Sun)推動爪哇(Java)技術成為共同技術標準(Garud et al., 2002)。話說昇陽雖為開放原始碼之領導廠商，惟面對微軟此一強力競爭者，昇陽難以憑藉一己之力對抗微軟，因此當時昇陽的策略行動是動員其他人、說服大家一同支持爪哇技術，因此爪哇技術在眾人的支持下開始萌芽與成形。也就是說，行動者的策略行動可藉由聚集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可能包括競爭者)，形成聯盟或團體進行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Maguire et al., 2004)。

只是當爪哇技術開始要進入擴散階段後，雖然有許多成員陸續加入爪哇聯盟，但由於各個成員可能有自己的策略以及私利，慢慢地開始不遵守聯盟的規範，甚至在聯盟中舉起反對旗幟，這都有可能造成聯盟的瓦解，因此當時的昇陽藉由一些政治手段來維繫聯盟的運作，但此時的控制力量又是一種兩難的矛盾，對於昇陽來說與競爭者合作之間之競合矛盾的拿捏變得重要，因為若過於寬鬆會導致標準瓦解或失去控制權，若過於緊控又會抑制技術創意與新興標準的出現。

情境三：成熟場域與邊陲行動者

在成熟場域中，其環境特色是可以觀察與感受到一個穩定之結構力量的存在，而且場域內既存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很密切。在這樣的脈絡環境下，對於邊陲行動者而言，雖然較既得利益者有更強烈的改變動機，但他們是屬於缺乏影響力的個體或組織，力量薄弱，而且在組織存續的風險考量上同樣具有新之不利的本質。故在此情境下，邊陲行動者難以孤軍奮戰，其實踐策略行動的重點在於如何藉由社會關係連結到其他場域中有影響力的成員，動員他們成為志同道合的同伴，彼此之間進行合作與聯盟，來增加此時邊陲行動者本身的正當性(Fligstein & Mara-Drita, 1996)，亦即邊陲行動者扮演領導的角色，並且為成員間的合作打造一個群體形象去對抗既存成熟場域環境中的限制。

在此情境下，文獻上的具體案例可從美國的廣播電視產業來觀察。在當時美國的廣播電視已有既存的技术與標準，惟同時期的日本已經開始發展高畫質電視(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HDTV)的技術，因此有美國業者(但非原本的核心廠商)欲從日本引進HDTV技術進入美國，卻因為FCC對於釋放頻譜有所疑慮，以及在不確定市場接受度之下，相關廠商要更換設備、更新技術、製作新的節目內容所付出的轉換成本過高之故，使得HDTV的技術在1980年代的美國發展的並不好。對此，美國業者開始逐步對一些協會施予力量，而後遂由美國全國廣播業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ing; NAB)暨美國電子協會(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AEA)以輿論的力量，搭配國家競爭力的言論來向政府建言，說道倘若美國放棄HDTV接收器的生產，未來美國將失去50%的全球半導體市場(Dowell, Swaminathan, & Wade, 2002)。

在美國廣播電視產業的案例中，行動者要動員場域內的其他成員成為「志同道合」夥伴，以協會的方式發揮「眾志成城」團結力量大的效果，表現為一種「群體性制度興業」(Collectiv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的形式(Wijen & Ansari, 2007)。此種策略作法意味著成員間應該具有一致的方向與目標，進而仰賴場域中不同參與者的互動與合作，在互動過程中彼此間交換訊息與資源。行動者要維繫志同道合、眾志成城的團結形式，並管理成員間的互動合作關係，是需要努力的、需要獨特的政治手腕與社會技能(Fligstein, 2001; Perkmann & Spicer, 2007)。

另外，處於成熟場域、但由邊陲行動者改變制度的具體案例有二：第一、法國評等機構 ARESE 在金融市場中引進社會責任投資基金的過程。原先的金融市場相當仰賴由量化指標構成的評估系統，但是當 ARESE 欲引入社會責任投資基金時，尤其此基金特別挑選那些著重在環保與綠能的企業，環保與綠能的相關活動不見得與企業原本的核心商業活動有所關連，從財務報表上也無法判斷這些企業的社會責任績效，因此社會大眾對此基金感受到相當的陌生感與不確定性。因此，ARESE 的策略行動就是服膺社會大眾對評估系統的依賴性，另外建構一個名為「企業社會績效評估系統」，因為指標的建立意味著針對相關概念給予定義、可以進行客觀面的衡量、可被標準化、以及可進行相互比較等特性，因此 ARESE 可藉由此系統在指標方面的設計，來符合基金管理者的實務認知與慣例，也透過企業社會績效評估系統在場域中獲取系統性權力(Dejean et al., 2004)。

第二、在愛迪生推展電力照明系統的故事中，我們發現愛迪生並非以劇烈式的創新改變來取代煤氣照明，因為既存體系勢必抗拒愛迪生的發明與創新，愛迪生反而是藉由模仿煤氣照明的特性，以電力站方式集中產生電力，再配送至用戶端；在照明亮度方面，初步決定發展亮度為 12 瓦特的燈泡，雖然愛迪生有能力發展 2~3 倍的亮度；在電力配送方面，雖然知道裸露的銅線會洩漏電力並燃燒電路，仍決定採取與煤氣照明傳輸一樣的地下化鋪設；甚至在計價方式上亦模仿煤氣照明公司，以電表來告知消費者應支付多少電費，並讓早期響應的客戶免費使用六個月的照明電費，以既有的大眾認知與使用習慣來推廣燈泡。畢竟，既存煤氣照明的框架與內涵塑造了消費者、主政者、甚至投資者的思維邏輯，因此儘管愛迪生腦中有其構築的未來藍圖，仍以目的性進行全盤考量，決定犧牲某些創新特質來迎合既存的大眾認知與現有體制(Hargadon & Douglas, 2001)。

從法國評等機構 ARESE 在金融市場中引進社會責任投資基金，以及愛迪生推廣電力系統的兩個案例中，我們可觀察到當邊陲行動者要在一個成熟場域中催生一個新制度時，他們可採用所謂漸進取代的方式來推展新制度。因為新制度缺乏正當性，因此邊陲行動者盡量避免過於躁進，過於躁進的結果可能導致場域中其他成員的害怕與抗拒，因此必須克服的問題是，降低社會大眾對新實務作法的疑慮，以一句諺語「舊

瓶裝新酒」來形容，制度興業家所執行的制度策略必須在新與舊之間創造足夠的折衝空間，藉由服膺其他成員對既存制度的認知來吸引新夥伴的支持，動員追隨者與擁護者，逐步提高新制度實務在既存環境中的正當性，並獲得所需資源 (Aldrich & Fiol, 1994; Zimmerman & Zeitz, 2002)。

情境四：成熟場域與核心行動者

同樣在成熟場域中，依然面對的環境特色是有一個穩定之結構力量的存在，而且場域內既存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很密切。在這樣的脈絡環境下，對於成熟行動者而言，其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鑲嵌於結構中的行動矛盾 (Seo & Creed, 2002)。資源豐富的核心行動者，通常是既存成熟場域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們通常無法預視具有潛力的替代方案，或是能夠預視卻迫為必須順從目前的社會規範與制度實務。因此，對於核心行動者而言，當意識到舊制度的侷限與缺憾時，加上本身對於既存環境的反省與檢視，這樣的驅動力將是經由內生動機所驅使並帶動制度改變的源起，亦即，核心行動者實踐策略行動的重點在於如何突破既有窠臼來帶動制度改變。

在此情境下，文獻上的具體案例可從法國廚藝文化的轉變來觀察。1960 年代之前，法國廚藝文化是所謂的傳統法國料理，其特色是菜單冗長 (因此備料必須齊全導致菜色不新鮮)、強調餐盤外的儀式、用餐時間長等，因此在 1960 年代末期，擁有米其林指南授與星星榮譽的菁英主廚，受到當時訴求自由平等理念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他們開始有了不同的主張，具體的策略行動就是從外引入許多其他國家的料理方式，如日本、義大利、西班牙等，促成法國廚藝逐漸轉變為所謂的新派料理法，講求創意、新鮮與清淡 (Rao et al., 2003)。

在法國廚藝文化改革的案例中，揭示的具體作法就是，核心行動者可從場域外的範疇，搜尋不同資源與爭取認同，將之引入或是移轉來帶動制度改變。場域範疇外的成員可以是不同位置的組織，如：政府、國內外學校、甚至是全球市場中的國際企業等，這些成員對於核心行動者來說是場域外的「Outliers」，是脫離 (Dis-embedded) 既存場域的異類。用植物的異花授粉 (Cross-pollination) 來比擬 (Hargadon & Sutton, 1997)，這些異類的想法、資源與實務作法等，都讓行動者有機會探尋更多元化的機會與管道，延伸組織在全球網絡中的位置，透過這些機會與管道，核心行動者可以有效克服限制，是一種範疇橋接的概念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另外，處於成熟場域、但由核心行動者改變制度的具體案例是加拿大亞伯特省健康照護系統的改革。在加拿大的聯邦政府架構下，從 1957 年以來，是由轄下的各省政府全權掌管公共健康保險，然於 1980 年代感受到醫療成本成長的壓力，於是開始控制保險計畫的擴張與進行預算的限制，其中亞伯特省的政府為了進行健康照護的改革，將原本以醫生為主之醫療專業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的場域制度結構，藉由在 1994 年頒佈的區域健康管理局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 RHA) 法案，在場域中設立

了一種新類型的成員－區域健康管理局，來改變場域的結構以及資源分配的方式，將全省 90% 的醫療資源透過區域健康管理局再分配至地區的醫療機構，此時政府主導將新場域的制度結構轉變為以類商業的健康照護 (Business-like Health Care) 為主，在區域健康管理局中降低醫生參與決策的比例，改由延攬具商業思維的管理者，進行有效醫療與資源效率運用的改革 (Reay & Hinings, 2005)。

從加拿大亞伯特省健康照護系統改革的案例中，當核心行動者是政府的話，政府通常可以運用權力 (Power) 來促使改變，此時權力展現為能動性的運用空間，在權力手段上可以是法令的頒佈、主張與執行，而且權力手段的施展則必須貫徹在整個制度改變的過程。

伍、討論與意涵

本研究根據制度興業的理論觀點，探討行動者 (興業家) 如何運用策略，改變其所處的制度環境。因此，本文的關注重點為置放於行動者實踐能動性之策略行動構面，以及其與所處脈絡環境所產生的鑲嵌性，並以場域的制度化程度與行動者位置這兩個構面，解構制度興業活動發生的起始脈絡條件，藉此整理文獻發展一個制度策略的整合架構，來解釋制度興業家在不同情境下會如何創新不同的制度與帶動制度改變。奠基在此整合架構下，一方面整理了先前的研究，針對每一種情境型態，針對該情境發生的可能動機進行描述，並在該種情境型態下，以文獻上的具體案例為佐證 (請見表 1)，另一方面此整理也對未來研究提供了參考依據與藍圖。

表 1 制度興業策略之整合性架構的文獻整理成果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情境型態	萌芽場域與邊陲行動者	萌芽場域與核心行動者	成熟場域與邊陲行動者	成熟場域與核心行動者
情境描述	新之不利資源匱乏	無例規存在老化風險	既有結構存在影響力侷限	鑲嵌於結構中的行動矛盾
範例場域 & 策略行動	美國資源回收產業	聯合國促成環保公約的簽署	美國廣播電視產業引入 HDTV	法國廚藝文化的改革
	論述策略	論述策略	聯盟策略	範疇橋接策略
範例場域 & 策略行動	丹麥風力發電產業	美國昇陽推動爪哇	法國社會責任基金、電力系統	加拿大健康照護系統的改革
	湊組策略	聯盟策略	漸進取代策略	法規制訂策略

在情境一與情境二中，同為萌芽場域，亦即行動者要在一個萌芽場域中創新一個制度，此時是為一種制度形成的制度化過程（亦即邊陲行動者要帶動一種新邏輯、新治理架構的產生、或新興領域的崛起）。只是在情境一中，行動者位處場域邊陲，此際身為一個小型或初創的組織，通常會面臨新之不利的困境，而且經常面對的是資源匱乏的窘境，此時論述策略與湊組策略是邊陲行動者可具體利用的策略作法，藉由論述策略闡明新制度的優點與主張，來爭取場域成員的認同，同時亦可藉由湊組策略開發手邊既有資源來達成新目標的實踐。相對地，在情境二中，此時行動者位處核心，要促成一種新制度的成形，資源豐富度與否通常不會是核心行動者的主要考量，核心行動者要留意的是老化風險是否會阻礙組織察覺新制度或新興領域崛起的機會，假若核心行動者意識到必須有所改變時，通常其可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同樣以論述策略來主張新制度的優點，亦可藉由聯盟策略來號召聚集眾人之力，共同創新一個新制度。

在情境三與情境四中，同為成熟場域，亦即是行動者要主導一個去制度化（既存制度邏輯的式微）或再制度化（新制度邏輯取代既存架構）的過程。只是對於位處場域邊陲的行動者而言，缺乏影響力絕對是關鍵影響因素，因此合縱連橫的聯盟策略同樣是有效的策略行動，另外也因為缺乏影響力，因此邊陲行動者也只能以蠶食、再鯨吞的方式來侵蝕既存制度的基礎，達到改變制度的目的。相對地，在情境四中，當行動者是既存利益者，位處場域的核心位置時，所面對的就是一種鑲嵌於結構中的行動矛盾，既得利益的盲點或壓力都會讓核心行動者傾向更加穩固既存制度，因此為了突破矛盾與困境，借鏡他人的範疇橋接策略是一種相當有力的作法，可藉由第三方實務的啟發與引進，激發成熟場域中的新興火花；另外，核心行動者通常有時會是政府單位，因此為了積極突破窠臼，運用制訂法令、規範與政策的權力，藉由強制力量促成改變制度則是一種不得不為的手段。

陸、結論

本文延伸制度理論，在制度鑲嵌性的制約下引入行動者所懷具之社會能動性，採用結合兩者概念的制度興業觀點探討制度如何改變，而此趨勢也在 1980 年代末期 DiMaggio (1988) 的研究之後開始受到重視 (Hardy & Maguire, 2008; Battilana, Leca, & Boxenbaum, 2009; Pacheco et al., 2010)。制度興業觀點在概念上突破了傳統制度理論中由結構所主導的同形行為與同質互動，行動者藉由策略意圖刻意展現「同」中求「異」的行動力，去辨識不同價值、不同特徵的新制度，並積極定義新制度的可行性與好處，藉以突破那種被視為理所當然之既有制度力量，而且在突破過程中同時需要行動者發揮極大的毅力以及投入非比尋常的資源與努力。換言之，制度興業觀點本質上解放了制度的束縛，引入社會能動性探討制度如何改變，而本文特別是從行動者的角度切入探討行動者所實踐的策略作為。

同時，在制度興業觀點下，本文的前提認知是，興業家得以成功是因為行動者的適應力，他們會根據脈絡環境以及手邊所擁有的資源來進行判斷與調整，進而策略性地實踐行動與作為。因此，瞭解行動者與其所處之制度環境的鑲嵌性是重要的，建構制度興業理論基礎的首要條件就是辨識改變與創新制度的起始條件 (Battilana et al., 2009)，接續的核心焦點就是進一步地解構脈絡環境，並主張場域的制度化程度與行動者位置是解構脈絡環境鑲嵌性的二大構面，並據以發展一個整合架構來整理制度興業的相關文獻。此架構給予亟欲改變制度的行動者提供了指引，此架構呈現的是策略行動者必須因應環境鑲嵌性的不同，來設計得以改變制度的制度策略，在資源上有所調整，而沒有所謂一體適用的萬靈丹作法。

學者 Oliver (1991) 闡述在制度壓力之下行動者可以選擇不同程度的策略回應，從默認、妥協、躲避，進而到對抗、操縱等策略類型，然而卻未指出在何種情境下，應該如何回應。對此，本文發展出的分類架構具有脈絡敏感性，可以支持較為系統性、且跨脈絡環境的比較，可用來區辨制度改變過程中發生制度興業現象之不同程度的影響，而此超過任何單一的實證型文章，是為本文的研究貢獻。

然而，對此架構，必須進一步強調的是，在此四種情境中，行動者所採行的制度策略並非獨立與互斥，有時某種策略作法可同時被核心成員與邊陲行動者所採用（例如論述策略同時出現在情境一與情境二），有時亦可同時適用於萌芽場域與成熟場域（例如聯盟策略則同時出現在情境二與情境三），因此此處的區分描述僅是為了進行理論概念上的約略區分，而非實徵應用上的絕對分野。然而，我們相信行動者的策略行動具有脈絡敏感性的特質，會根據情境脈絡環境有其不同的適用性與差異。

Innovating Against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 Agency of Strategic Actors

Min-Fen T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Summary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ntrepreneurship have recently become phenomena of interest among organizations and been regarded as a wider societal trend. Efforts to change institutions—such as their norms, cultural factors, customs, codes of conduct, and traditions—face the strong power of structural inertia. Achiev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a complex process involving different contextual backgrounds. Thu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strategic actors embody agency to change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For this questi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e adopted to elucidate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he notion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which combines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agency and structure—and implies that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still have agency space for strategic choices, even when they are under some constraints.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has emerged to help answer the 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 that i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presents the activities (i.e., institutional strategy) of actors (i.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who have interests in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who leverage resources to create new institutions or to transform existing one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re regarded as an “analytically distinguished social type who has the capability to take a reflective position towards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and can envision alternative nodes of getting things done”. Other terms used to describe 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include field makers, rule makers, strategic actors, or institutional designers. Achieving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ould be catalyzed by institutional strategy, which is a “pattern of organizational action concerned with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s, fields, and the rules and standards that control those structures.” Said another way, the existence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s not destined but is exercised by strategic actions implemented b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ctions are “as the outcome of the type of social skill that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possess and how that skill translate into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produce organizational field.” Social skills employed by actors vary depending upon what is necessary, and many useful skills or tactics are studied in the literature, such as framing action, story-telling,

discourse, aggregating interests, and etc. Thu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play among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the institutional strategy, and the embedded environment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embeddedness.

When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one must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mbeddedness, because enabling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would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what the actors do. The emphasis in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comprising two dimensions—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n actor's position within the field—to shed light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cesses. 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emerging and mature for their field characteristics. The emerging field is an under-organized domain, where little coordinated action exists among them. In contrast, mature fields represent relatively well-structured configurations where there are identifiabl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such as domination, subordina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ctors' social positions could be distinguished into peripheral and central to capture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field. Social posit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might affect both actors' perception of a field and their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engage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emerging vs. mature) and the actors' social positions (peripheral vs. central) interlace each other into four enabling conditions: (1) peripheral actor in emerging field, (2) central actor in emerging field, (3) peripheral actor in mature field, and (4) central actor in mature field.

This study argues that socially skille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who are cognizant of, and sensitive to,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are embedded, can selectively adopt different means and way to craft their visions. In the first enabling condition—peripheral actor in emerging field—actors who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and a lack of resources can use the discourse strategy (e.g., the for-profit recycling industry in the U.S.) and the bricolage strategy (e.g., the wind turbines in Denmark) to shap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industry. In the second enabling condition—central actor in emerging field—actors who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no existing rules and an aging risk can adopt the discourse strategy (e.g.,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the aggregating strategy (e.g., the Java alliance) to shape the emergence of new, global,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In the third enabling condition—peripheral actor in mature field—actors who are constrained by the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 may carry out strategies of aggregating (e.g., the U.S. 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the gradually-replaced measurement tool (e.g., the French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ustry) to achieve legitimacy for their activities. Finally, in the fourth enabling condition—central actor in mature

field-actors who are embedded in the existing benefits may carry out on the strategies of bridging (e.g., the nouvelle cuisine movement in France) and of regulation-enacting (e.g., the health reform in Alberta, Canada)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This study presented the integrative framework to highlight embeddedness, revealing different contexts as the enabling conditions for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t examined how actors execute agency when engaging with micro-level strategic actions to change or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However,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actors in the four enabling conditions are not independent and exclusive. One example is that the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and framing can be used simultaneously by both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ctors (the first and second conditions). The other example is that the aggregating strategy can be suitable for both the emerging and mature fields (the second and third conditions). The purpose of distinguishing them here is for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not for empirical separ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trategic actions is based on sensitivity to the contextualization.

參考文獻

- Ahmadjian, C. L., & Robinson, P. 2001. Safety in numbers: Downsizing and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ermanent employment in Japa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6 (4): 622-654.
- Aldrich, H. E., & Fiol, C. M. 1994. 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re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 (4): 645-670.
- Anderson, P., & Tushman, M. 1990. 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ies and dominant designs: A cyclical model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 (4): 604-633.
- Baker, T., & Nelson, R. E.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 (3): 329-366.
- Barley, S. R. 1986. Technology as an occasion for structuring: Evidence from observations of CT scann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of radiology departme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 (1): 78-108.
- Battilana, J. B., Leca, B., & Boxenbaum, E. V. A. 2009. How actors change institutions: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3 (1): 65-107.
- Beckert, J. 1999. Agency, entrepreneur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 and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tudies*, 20 (5): 777-799.
- Benford, R. D., & Snow, D.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In K. Gook, & J. Hagan (E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s.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NY: Doubleday.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MA: Polity.
- Bush, P. D. 1987.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1 (3): 1075-1116.
- Campbell, J. L. 2004.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rroll, G. R. 1987. *Publish and perish: The organizational ecology of newspaper industrie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Child, J., Lu, Y., & Tsai, T. 2007.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building an environmental

- protection system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7): 1013-1034.
- Christensen, C. M., & Bower, J. L. 1996. Customer power, strategic investment, and the failure of leading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3): 197-218.
- Clemens, E. S., & Cook, J. M. 1999.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ism: Explaining durabil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1): 441-466.
- Dacin, M. T., Goodstein, J., & Scott, W. R. 2002.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research forum.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 45-56.
- Davis, G. F. 1991. Agents without principles? The spread of the poison pill through the intercorporate network.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4): 583-613.
- Davis, G. F., Diekmann, K. A., & Tinsley, C. H. 1994.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conglomerate firm in the 1980s: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or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4): 547-570.
- Dejean, F., Gond, J. P., & Leca, B. 2004. Measuring the unmeasured: A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strategy in an emerging industry. *Human Relations*, 57 (6): 741-764.
-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2): 147-160.
- DiMaggio, P. J. 1988.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L. G. Zucker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3-22. Cambridge, MA: Ballinger.
- Dorado, S. 2005.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partaking, and convening. *Organization Studies*, 26 (3): 385-414.
- Dowell, G., Swaminathan, A., & Wade, J. 2002. Pretty pictures and ugly scenes: Political and technological maneuvers in 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19: 97-13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Emirbayer, M., & Mische, A. 1998. What is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4): 962-1023.
- Farjoun, M. 2002. The dialectic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emergent and turbulent fields: The history of pricing conventions in the on-line database indust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5): 848-874.
- Fligstein, N. 1997. Social skil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4): 397-405.

- _____. 2001.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 (2): 105-125.
- Fligstein, N., & Mara-Drita, I. 1996. How to make a market: Reflections on the attempt to create a single market in the European Un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1): 1-33.
- Friedland, R., & Alford, R. R. 1991. Br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W. W. Powell &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232-26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rud, R., Hardy, C., & Maguire, S. 2007.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s embedded agenc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7): 957-969.
- Garud, R., Jain, S., & Kumaraswamy, A. 2002.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sponsorship of common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The case of the Sun Microsystems and Jav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 196-214.
- Garud, R., & Karnøe, P. 2003. Bricolage versus breakthrough: Distributed and embedded agency i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olicy*, 32 (2): 277-300.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MA: Polity.
- Green Jr, S. E. 2004. A rhetorical theory of diffus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9 (4): 653-669.
- Green Jr, S. E., Li, Y., & Nohria, N. 2009. Suspended in self-spun webs of significance: A rhetorical mod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ly embedded agen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1): 11-36.
- Greenwood, R., & Hinings, C. R. 1996. Understanding radical organizational change: Bringing together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4): 1022-1054.
- Greenwood, R., Hinings, C. R., & Suddaby, R. 2002. Theorizing change: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fiel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 58-80.
- Greenwood, R., Oliver, C., Suddaby, R., & Sahlin, K. 2008.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Los Angeles, CA: Sage.
- Greenwood, R., & Suddaby, R. 2006.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 The big five accounting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1): 27-48.
- Hardy, C. 1994. Under-organized interorganizational domains: The case of refugee system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s*, 30 (3): 278-296.

- Hardy, C., & Maguire, S. 2008.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R. Greenwood, C. Oliver, R. Suddaby, & K. Sahli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198-217. London, UK: Sage.
- Hargadon, A., & Sutton, R. I. 1997. Technology brokering and innovation in a product development fi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4): 716-749.
- Hargadon, A. B., & Douglas, Y. 2001. When innovations meet institutions: Edison and the design of the electric ligh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6 (3): 476-501.
- Hargrave, T. J., & Van De Ven, A. H. 2006. A collective action model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4): 864-888.
- Haveman, H. A., & Rao, H. 1997. Structuring 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evolution in the early thrift indu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6): 1606-1651.
- Hillman, A. J., & Hitt, M. A. 1999.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 A model of approach, 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y decis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4): 825-842.
- Hirsch, P. M. 1986. From ambushes to golden parachutes: Corporate takeovers as an instance of cultural framing an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 800-837.
- Hoffman, A. J. 1997. *From heresy to dogma: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San Francisco, CA: New Lexington Press.
- _____. 1999.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U.S. chemical indust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2 (4): 351-371.
- Holm, P. 1995.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in Norwegian fisher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3): 398-422.
- Hudson, R. 1994. Institutional chang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regeneration: Myths and realities from Europe's old industrial areas. In A. Amin, & N. Thrift (Ed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196-21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ng, S. C. 2004. Explaining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The dynamic reconciliation of action and structure. *Human Relations*, 57 (11): 1479-1497.
- Hung, S. C., & Whittington, R. 1997.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A pluralistic account of strategies in the Taiwanese computer industry. *Organization Studies*, 18 (4): 551-575.
- _____. 2011. Agency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aiwanese IT. *Research Policy*, 40 (4): 526-538.
- Ingram, P., & Rao, H. 2004. Store wars: The enactment and repeal of anti-chain-store legislation 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 (2): 446-487.
- Jepperson, R. L. 199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W. W. Powell, &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43-16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raatz, M. S., & Zajac, E. J. 1996.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llegitimate organization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5): 812-836.
- Lawrence, T. B. 1999. Institutional strateg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5 (2): 161-187.
- Lawrence, T. B., & Phillips, N. 2004. From moby dick to free willy: Macro-cultural discourse an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institutional fields. *Organization*, 11 (5): 689-711.
- Lawrence, T. B., & Suddaby, R. 2006.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work. In S. Clegg, C. Hardy, T. Lawrence, & W. R. Nord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2: 215-254. Oxford, UK: Sage.
- Leblebici, H., Salancik, G. R., Copay, A., & King, T. 1991.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fields: An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U.S. Radio broadcasting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3): 333-363.
- Levi-Strauss, C. 1967.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ounsbury, M., & Crumley, E. T. 2007. New practice creation: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7): 993-1012.
- Lounsbury, M., & Glynn, M. A. 2001.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Stories, legitimacy, and the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6/7): 545-564.
- Lounsbury, M., Ventresca, M., & Hirsch, P. M. 2003. Social movements, field frames and industry emergence: A cultural-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US recycling. *Socio-Economic Review*, 1 (1): 71-104.
- Maguire, S., & Hardy, C. 2006. The emergence of new global institutions: A discursive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tudies*, 27 (1): 7-29.
- _____. 2009. Discourse and de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decline of DD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1): 148-178.
- Maguire, S., Hardy, C., & Lawrence, T. B. 2004.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fields: HIV/AIDS treatment advocacy in Canad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5): 657-679.

- McInerney, P. B. 2008. Showdown at Kykuit: Field-configuring events as loci for conventionalizing accoun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5 (6): 1089-1116.
- Meyer, J. W. 1996. Otherhood: The promulg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deas in the modern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In B. Czarniawska, & G. Sevón (Eds.), *Translat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240-252. Berlin, GR: de Gruyter.
-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2): 340-363.
- Meyer, R. E. 2006. Visiting relatives: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13 (5): 725-738.
- Munir, K. A. 200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vents: 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photographic field. *Organization Studies*, 26 (1): 93-112.
- Munir, K. A., & Phillips, N. 2005. The birth of the "Kodak Moment" :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Organization Studies*, 26 (11): 1665-1687.
- Oliver, C. 1991.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 (1): 145-179.
- _____. 1992. The antecedents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3 (4): 563-588.
- Pacheco, D. F., York, J. G., Dean, T. J., & Sarasvathy, S. D. 2010.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 tale of two theor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6 (4): 974-1010.
- Perkmann, M., & Spicer, A. 2007. Healing the Scars of History: Projects, skills and field strategies i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7): 1101-1122.
- Phillips, N., & Lawrence, T. B. 2000.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field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7 (1): 23-43.
- Porter, M.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Rao, H. 199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putation: Certification contests, legitim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1895-1912.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8): 29-44.
- _____. 1998. Caveat emptor: The construction of nonprofit consumer watchdog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4): 912-961.
- Rao, H., Monin, P., & Durand, R. 2003.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oque ville: Nouvelle cuisine

- as an identity movement in French gastr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4): 795-843.
- Rao, H., Morrill, C., & Zald, M. N. 2000. Power plays: How social movemen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create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In R. I. Sutton, & B. M. Staw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239-282.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Reay, T., & Hinings, C. R. 2005. The recomposi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Health care in Alberta. *Organization Studies*, 26 (3): 351-384.
- Scott, W. R. 1994. 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fields: Link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al systems. In H. Derlien, U. Gerhardt, & F. Scharpf (Eds.), *Systemrationalität und partialinteresse*: 203-221. Baden-Baden, GR: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 _____. 2001.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cott, W. R., Ruef, M., Mendel, P., & Caronna, C. 2000.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From professional dominance to managed car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eo, M. G., & Creed, W. E. D. 2002.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praxi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 (2): 222-247.
- Sherer, P. D., & Lee, K. 2002.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large law firms: A resource dependency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 102-119.
- Short, J. 2009. The art of writing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 (6): 1312-1317.
- Snow, D. A., & Benford, R. D.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n D. M. Aldon, & M. M. Carol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133-155.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 A., Rochford Jr, E. B., Worden, S. K., & Benford, R.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 464-481.
- Stinchcombe, A. L.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J. G.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163-178.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 Suchman, M. C.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3): 571-610.
- Suddaby, R., & Greenwood, R. 2005.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legitimacy. *Administrative*

- Science Quarterly*, 50 (1): 35-67.
- Thornton, P. H. 2002.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ion in a craft industry: Conflict and conformity in institutional logic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 81-101.
- Thornton, P. H., & Ocasio, W. 1999.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y of power in organizations: Executive success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 1958-199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3): 801-843.
- Tolbert, P. S., & Zucker, L. G. 1996.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S. R. Clegg, C. Hardy, & W. R. Nord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175-190. London, UK: Sage.
- Weick, K. E. 196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Whittington, R. 2006. Completing the practice turn in strategy research. *Organization Studies*, 27 (5): 613-634.
- Wicks, D. 2001. Institutionalized mindsets of invulnerability: Differentiated institutional fields and the antecedents of organizational crisis. *Organization Studies*, 22 (4): 659-692.
- Wijen, F., & Ansari, S. 2007. Overcoming inaction through collectiv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sights from regime theory.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7): 1079-1100.
- Zilber, T. B. 2002.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an interplay between actions, meanings, and actors: The case of a rape crisis center in Isra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1): 234-254.
- _____. 2006. The work of the symbolic in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Translations of rational myths in Israeli high te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2): 281-303.
- _____. 2007. Stories and the discursiv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Israeli high-tech after the bubble.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7): 1035-1054.
- Zimmerman, M. A., & Zeitz, G. J. 2002.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 (3): 414-431.
- Zucker, L. G. 1988.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Ballinger.

作者簡介

* 涂敏芬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現為私立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論文曾發表於 R&D Management、管理學報、中山管理評論、科技管理學刊等國內外學術期刊。目前研究興趣包括技術創新與制度興業等議題。

Min-Fen Tu

Min-Fen Tu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amkung University, Taiwan. She received her PhD from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er works have appeared in R&D Management and some Taiwanese management journals. Her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E-mail: mftu@mail.tku.edu.tw